

教育生态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外语教材理论体系构建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

摘要:外语教育是个生态系统。教材开发与编写是外语教育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教材是实现学科教学目标的载体与途径。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教材不仅仅体现课程方案、课程标准的要求,承载学生学习学科课程的内容,充当教师落实课程要求、贯彻“立德树人”教育方针的依据和蓝本,更是学生学习学科知识、提升核心素养的最重要的支撑与资源。因此,教材理论研究,不仅仅要研究教材的性质与特征、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理论和实践依据,还应研究教材编写的组织实施过程以及教材使用的情况。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在充分研究外语教育生态系统特征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教材理论体系既应该包括宏观角度对教育生态系统中各参与者和重要因素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还应该包括中观角度教材编写、评估和使用的依据和标准,以及微观角度教材的构成、内容、呈现方式等等。

关键词:中国;外语教材;教材使用;教材编写;理论体系;教育生态

Chinese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Research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SHU Dingfa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FLT is an ecosystem, of which textbook development is one important link or component. Within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textbooks are the means to achieve curriculum objectives. Textbooks not only embody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flesh out curriculum content, and implement educational policies, but also offer vital support and resources for the students to acquire subject knowledge and develop key competencies. Hence, research on textbooks should not only concentrate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extbook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ories, and practical concerns in their development, but also reflect on the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writing textbooks, and the actual use of textbooks in the classroom context.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logical features of FLT, Chinese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research should consider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t a macro-level, the criteria and standards for textbook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nd consumption at a meso-level, and the components, content, and layout of textbooks at a micro-level.

Key words: China; textbooks; textbook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system; educational eco-system

1. 引言

教材,也称教科书,英语为 textbook,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 materials 一词,甚至有取代前者的趋势。在中国文化传统和教育体制中,教材一直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从教材的另一个名称

“课本”中也得到体现。“课本”,课程之本也。教师教的是“教材”,学生学的是“教材”,甚至需要背诵教材,考试的依据也通常是教材。教科书与“标准”和“权威性”几乎是同义词。

近年来,教材建设与管理工作的中国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19年12月,教育部同时出台了《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三个《管理办法》明确指出,教材是“国家事权”。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

研究外语教材及其使用、构建教材编写和评估理论体系以及编写符合中国国情的各级各类外语教材,是新时代对外语教育理论研究者提出的新的挑战,也为广大的外语教师和理论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机遇。

教材是外语教育生态系统中各方能量互动和传输的重要体现(Shu *et al.* 2023a, 2023b),因此研究教材必须将其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中,考察其与生态系统各参与者的关系以及其本身在这个系统中所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本文基于教育生态系统理论(束定芳 2021, 2022),探究教材的定位、编写和使用在教育生态系统运作中的作用,构建新时代外语教材理论体系。

2. 外语教材研究的重要课题

2.1 Harwood 的“教材研究三领域”

Harwood(2014)认为教材理论研究议题包括三个方面:(1)教材内容(materials content),即研究教材应该或不应该包括的内容,包括主题、语言信息、教学方法和文化;(2)教材使用(materials consumption),即研究教师和学生是如何使用教材的;(3)教材编写与出版(materials production),即研究教材规划、编写和发行的过程;研究教材编写者的设计过程;出版社对编者的要求、提供的资源支持(affordances)、提出的限制;整个教材行业的规矩和价值等。

2.2 教材研究的多元视角

Norton & Buchanan(2022)主编的《劳德里奇语言教学材料开发手册》共设9个章节,分别讨论了以下9个方面的问题:(1)语言教材的变革与发展;(2)教材开发中的争议话题;(3)理论与教材开发;(4)服务语言学习和技能培养的教材;(5)教材评估与二次开发;(6)特定语境下的教材;(7)教材发展与技术;(8)用于出版的教材开发;(9)教材编写。这些话题虽然有重叠之处,但基本反映了教材研究领域的热点。

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教材的研究已经摆脱了研究教材本身的局限,把教材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语境中加以审视。他们在宏观上关注教材的变革与发展,关注教材编者、出版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在中观和微观上关注教材开发与使用。

2.3 中国外语教材研究的目标与要求

聚焦国内外语教材研究传统,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们还缺乏科学、系统的教材研究。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外语类刊物陆续发表了有关教材评估标准的介绍和对相关教材的评价研究文章。到了21世纪初,学界开始有教材编写者介绍所编教材的依据和特色,外语教材理论研究开始受到重视。近10年来,有关教材开发历史、国内外教材评价研究逐渐增加,相关出版社也引进了国外出版的外语教材研究专著和论文集。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在近几年来连续出台了若干教材管理规定,并在全中国成立了20多家国家级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引领和支持着我国教材研究发展。特别是教育部在2020年颁布了《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在第四章“工作任务”中要求教材研究基地:(1)开展教材建设研究,……探索教材建设规律;(2)重点研究……教材内容价值导向与知识教

育有机融合;(3)重点研究……信息时代新形态教材等。《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还要求“收集整理本领域国内外……教材使用情况等,了解教材编写人员、任课教师等相关情况,形成教材建设数据中心,为教材研究、开发和管理提供资源支撑”。

由此可见,我国外语教材理论研究的目标是探索外语教材建设规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服务中国外语教育的教材体系和理论体系。

3. 教育生态视域下的外语教材理论研究

外语教育是整个教育生态体系的一部分。外语教材研究需要关注影响外语教材编写、使用的各项重要因素,特别是教师和学生。Maley(2016)从外语教育的系统性因素出发,提出教材理论研究涉及使用教材的教师学生、出钱购买教材的资助者(sponsor)、出版教材的出版社、规定其内容和大纲的课程标准、决定上课时间长度和强度并进行评价的教育体系、影响教材出版和使用的物质和经济条件以及学习所发生的文化。

笔者认为,外语教材理论研究应该重点研究中国外语教材编写和使用的历史和现状、新时期国家教育政策和发展需求、国际教材开发趋势,讨论教材的性质与功能、教材的编写规范、教材的评估与使用、教材与教师发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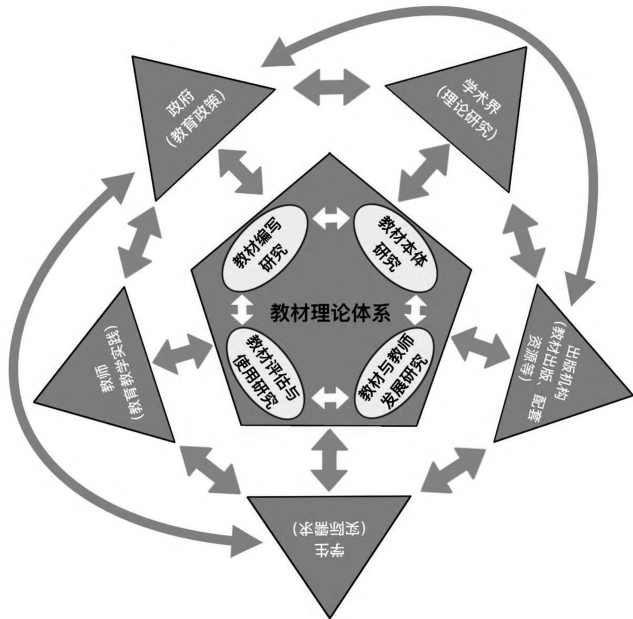


图1 外语教材理论体系

如图1,笔者认为,教材理论研究的核心部分有四个方面:(1)教材本体研究,这包括教材的性质与特点,教材的功能和局限,教材的内容与呈现方式等;(2)教材编写研究,教材理论需要研究教材编写的主体和组织方式,教材编写的步骤、依据和编写的原则;(3)教材使用研究,关注教师在教学中对教材的理解和使用情况,关注教材在学生外语学习过程中的真实作用等等;(4)教材与教师发展研究,这包括教材编写和使用过程对教师发展的作用等等。这四个方面的研究相互交织,彼此紧密联系。例如,教材本体研究不仅要关注教材内容本身,还需要关注教材编写过程,更需要关注真实使用中的教材,关注使用者对教材的评价与教材的实际使用效果;教材编写研究不但需要研究政策、理论,还需要研究已有的教材,研究教材使用者的真实需求;教材使用研究需要关注教

材编写者的意图和教育目标、学习者和教师的个体差异;教材与教师发展研究除了研究教材开发过程中的教师学习与专业发展,更要关注教材使用与教师专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同时,教材作为“国家事权”,是体现国家意志的教育教学载体。外语教材理论必须研究国家教育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未来国家发展对外语能力的需求;研究国家有关部门如何对教材工作进行管理,包括管理的内容、范围与方法。教材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相关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关注教师和学生真实需求和教材使用情况。教材理论研究还需要包括教材出版过程所涉及的相关因素,包括配套资源和智能化的教学资源等。总之,外语教材是外语教育生态系统中能量的集中体现,是各方力量的聚焦点,外语教材研究应该关注各方在系统中所承担的角色,发挥各方的优势,促进各方的专业发展。

3.1 外语教材的性质与特征

首先,外语教材理论研究应该明确的是:外语教材是什么?包括什么?其目标 and 功能是什么?

外语教学有其特殊性。外语教材的内涵和外延、教材与教辅、教学资源、教学材料的区别与联系等都是外语教材研究者的重要课题。有学者认为教材的作用是有限的,外语学习的需求不可能通过教材圆满解决。Allwright(1981: 9)认为,语言学习管理是复杂的过程,语言教材的内容多为事前决定的,无法解决语言学习中遇到的所有问题。O'Neill(1982: 110-111)也认为教材只是一种教学道具,可为教学活动提供一种框架,教材的编者须说明教材的局限。Carabantes & Paran(2022)把教材视为实际上的教学大纲(*de facto syllabus*)。Akbari(2008: 647)认为,后方法(*post-method*)也因为教材得到了加强,换句话说,教材在目前的教学方法和内容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教材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就是其为外语教学参与各方提供了一种结构、连贯性和成就感(Hutchinson & Torres 1994; Tomlinson & Masuhara 2018)。此外,外语教材除了提供语言输入、系统传授外语语言知识外,还被赋予更加广泛的教育功能,如批判性思维、生活技能、公民教育、全球问题、跨文化理解等等(Maley 2016)。鉴于其普遍性和重要性,外语教材通常还是开展和落实教育改革政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带来“有效、连贯”的效果(Hutchinson & Torres 1994: 321)。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教材应该是学材。如Tomlinson & Masuhara(2012)提出,“任何可以用于帮助学生学习一门语言的东西,包括教材、录像、分级阅读材料、卡片、游戏、网站以及手机互动都是学习材料”,它们应该具有“信息性”(informative,提供有关目标语的知识信息)、“指导性”(instructional,提供学习的方法)、“体验性”(experiential,提供学习者使用目标语的经历)、激励性(eliciting,鼓励学习者使用语言)以及“探索性”(exploratory,帮助学习者发现目标语)(Tomlinson & Masuhara 2013: 143)。理想的教材应该是学材,而不是教师用来教的材料(Tomlinson 2016b)。

Mishan & Timmis(2015)提出,教学材料除了提供学生学习材料、激发学生学习动机,还应该提供一种教师教育的手段,特别是同时配备教师用书的教材。Crawford, Luka & Cacioppo(2002: 81)指出了对全球性(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教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致残的拐杖”(debilitating crutch),另一种则把教材看作“有用的脚手架”(helpful scaffold)。前者认为教材剥夺了教师的创造性和积极性(Tomlinson 2003),形成依赖性(Hutchinson & Torres 1994: 315),而后者则肯定了教材在教师发展中的作用。教材对教师发展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

因此,教材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教材的定位,也就是对教材性质和功能的研究。教材的定位在不同的教育体制中是不同的,其法律地位也有区别。总体来看,有关外语教材的性质和功能的讨论有如下共识:(1)教材是某教育体系中教育政策的体现,是实现(课程)教学目标的手段、载体、资源和桥梁;(2)外语教材是学生语言学习的主要输入来源;(3)教材是系统呈现语言知识、并帮助学生内化相关知识的载体;(4)教材是训练学生语言技能和学习方法的手段;(5)教材是

教师和学生语言交流、实践的桥梁;(6)教材是语言学习与教学新理念、新方法的展示平台;(7)教材是学生获得新知识的资源,还是立德树人,培养学生道德情操和核心素养的重要抓手;(8)教材是跨文化学习和交流的工具;(9)外语教材是外语教育生态系统中各利益攸关方对外语教育功能、内容、方法认识的体现,也应该是外语教师和学生对外语教育的需求和期待的体现。

3.2 外语教材建设与编写研究

3.2.1 外语教材编写主体和组织形式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外语教材编写已有较长的历史。教材编写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教育生态系统中有不同的组织形式。近几十年来,教材编写主要可以分为商业组织形式、政府组织形式和政府与出版机构联合的形式。在欧美,教材作为一种商品,主要是由出版社聘用相关学者或者专业作者进行编写。例如,英国最大的语言类教材出版商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就组织编写、出版了许多面向全球的英语教材。在亚洲一些国家,教材编写是由政府机构,即国家教育部负责,有的是直接组织专家编写,有的是通过出版社组织相关的专家进行教材编写。在中国,教材编写经历了出版机构聘人编写、国家统一组织编写,到地方政府或出版机构组织编写、引进教材改编,再到国家主导编写出版的形式的变化。

教材编写的主体和组织形式,一方面反映了教育生态系统中作为主导因素的政府对教材的重视程度和管理方式,另一方面表明政策和资金对教材编写的支持程度。在中国,教材作为“国家事权”,政府,特别是教育管理部门如何行使对教材编写的管理权限,以及教材的评审和选用,是教材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即便是国际大型专业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教材,其内容和形式都要考虑相关国家针对教材的法律、政策,以及相关国家的教育传统、文化习俗等。因此,教材编写的组织形式及其利弊是教材编写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上海市 2018 年组织的普通高中非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为例。首先,上海市教委根据上海市作为全国基础教育改革试点地区之一所享受的特殊政策,向教育部申请根据上海市的实际情况编写供上海市高中使用的非统编教材。在此之前,上海市教委在部分高校成立了各学科基础教育“立德树人”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其职责之一就是编写或审核中小学教材。因此,在教育部批准上海市教委的申请后,市教委给各相关学科基地下达了主持编写上海市高中教材的要求,同时拨付教材编写专项经费,支持教材编写。第三步,市教委组织专家对参与教材出版的出版社进行了遴选。在随后的两年中,上海市教委组织了多次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和交流会议,对教材编写工作的政策要求、专业要求以及技术要求进行全面监督和推进。在教材初稿完成后,上海市教委还组织了上海市学科和思政专家,包括高校学科专家和高中教研员、骨干教师等审读反馈,组织试教试用,负责呈送教材至教育部组织的专家审核等。

目前,中国高等学校外语教材的编写主要还是由出版社主导。最常见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出版社策划,邀请知名学者担任主编,出版社与主编一起组建编写队伍,或由主编选择和组建编写小组。教材编写过程基本由主编负责,出版社负责审核,一般没有外审或送政府机构审核的程序。这样的编写机制一方面促进了教材品种的丰富性,如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英语》教材多达 100 多种;甚至一家出版社就有 10 种以上;另一方面,这种编写机制也造成了相关教材良莠不齐,甚至出现对课程或学科教学目标和内容造成误导的情况。

关于教材编写人员的选择,《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和《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中都对教材编写人员的资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例如,教材主编不仅需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在本学科领域有深入研究、较高造诣和学术威望,或是全国知名专家、学术领军人物,在课程教材或相关学科教学方面取得有影响的科研成果,有丰富的教材编写经验”,而且政治

上必须做到“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政治敏锐性强,能够辨别并抵制各种错误政治观点和思潮,自觉运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组织教材编写还应当考虑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开发基于一定理论原则和理论研究成果的创新性教材既需要作为专家的技能,又需要作为教师的专业经历(Dubin & Olshtain 1986),还需要广博和深刻的相关语言学知识。从这个角度看,教材编写是理论和实践的交汇点:理论应该指导实践,而教材在课堂的使用研究和评估可以提升教材的有效性,有利于理论的进一步提炼(Norton & Buchanan 2022)。基于教材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要求,理想的教材编写组应该有三类代表参加:学术背景强的研究人员、实践能力强的一线教师、兼具理论研究能力和实践经验的教研人员。

综上,对外语教材史的梳理,以及对不同国家和地区教材编写实践的比较研究,包括教材编写主体和管理方式的对比和实证研究,可以为我们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外语教材理论体系,指导外语教材编写实践提供重要的参考。

3.2.2 外语教材编写依据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学生作为生态链中最重要的一环,其实际语言水平和未来发展需求是教材编写的重要依据。教材是学生获得能量的重要来源。教材必须体现国家教育政策,符合思想性的标准;教材必须具备科学性,集中体现该学科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教材还必须具有适宜性和可行性,符合学生和教师的实际水平和需求,符合大部分学校现有的教学条件。

前面提到,外语教学过程包括需求分析、课程设计、教材开发、课堂教学、评估。教材开发或编写基于教学设计,而教学设计基于需求分析。就外语教学的需求而言,应涵盖学习者需求、教师需求和政府需求。其中,学习者需求包括个人需求(性别、年龄、兴趣、教育背景、学习风格等)、学习需求(学习经历、目前水平与目标水平之间的差距等)、未来需求等。教师需求也涉及个人需求(性别、年龄、文化背景、兴趣、教育背景、语言水平等)、专业需求(喜欢的教学风格、专业训练背景、教学经验等)。政府需求包括社会政治需求、市场需求、教育政策和各项制约因素,如时间、预算和资源等(Masuhara 1998: 240-241)。

因此,外语教材编写的依据可以概括为:1)课程要求;2)学科原理;3)学生和教师实际情况;4)技术支持和教学资源。

1) 课程要求(标准)

在政府主导的课程框架中,教材编写一般依据教育部门或国内外机构提供的课程大纲,如“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一些课程大纲体现了语言学习的具体路径,如“内容和语言融合学习”(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Deller & Price 2007; Mehisto *et al.* 2008; Dale & Tanner 2012),“特殊用途英语”(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或者是“学术英语”(EA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等。此外,基于政府层面或学术机构提供的课程大纲,教材编写团队还需要制定具体的教材编写方案。编写方案不仅涉及编写原则、编写程序和具体要求,还涉及以下具体的内容:具体的内容编排体系,如:主题、语篇类型、语言知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篇、语用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能(包括听、说、读、看、写)、学习策略(包括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交际策略、情感管理策略)等。

教材编写是国家教育政策的落实,因此,教材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在中国外语教育生态系统中,国家教育政策体现在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中。外语教材编写必须依据课程标准。因此,外语教材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课程标准本身以及如何将课标要求落实到教材内容的研究。

教育部颁布的各级学科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指南)都对教材编写提出了建议和要求。以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方案和课标中的相关内容为例。《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对教材编写提

出了专门的要求:

教材编写须落实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基于核心素养精选素材,确保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适宜性与时代性。创新体例,吸收学习科学的最新成果,强化内容的内在联系。创新教材呈现方式,注重联系学生学习、生活、思想实际,用小故事说明大道理,用生动案例阐释抽象概念,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加强情境创设和问题设计,引导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变革。充分利用新技术优势,探索数字教材建设。关注学生认知发展特点,强化教材学段衔接。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也有“教材编写建议”:

(1)坚持思想性原则,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面向全体学生,保证共同基础;(3)以主题为主线,整体设计教学活动;(4)提高英语教学的真实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机;(5)遵循语言能力发展规律,满足不同学段学生学习需求;(6)确保适当的开放性,为灵活使用教材创造条件;(7)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8)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提高英语教学的智能化。

在西方国家,教材编写通常由出版商主导,其编写往往没有类似于中国的“课程标准”作为依据。编者们主要根据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学界公认或权威学者所提倡的教学建议进行教材设计和编写。

2) 语言学和外语学习原理

外语教材编写必须符合语言学和语言学习的基本规律,参考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语言是个系统,语言由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等子系统组成;语言具有思维和交际的功能;语言是思维能力的体现,语言也能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语言具有社会性,语言反映社会身份和社会态度等等;相关的语言学习原理包括:语言能力在语言使用中获得,语言实践促进语言能力发展;认知是语言发展的基础,语言促进认知发展,等等。Ellis (2005) 提出了外语教学的“语言能力+10 大应用语言学原则”: (1)教学需要确保学生获得丰富的程序式表达方式和基于规则的能力;(2)需要确保学生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意义上;(3)需要确保学生也聚焦语言形式;(4)主要培养学生二语的隐性知识的同时不忽略显性的知识;(5)考虑学生的“内在大纲”; (6)成功的语言教学需要大量的二语输入;(7)成功的语言教学也需要输出的机会;(8)使用二语进行互动的机会对培养二语能力极为重要;(9)教学需要考虑学习者的个人差异;(10)在评价学习者的二语水平时,既要评价他的自由表达,也要评价其控制性表达。

语言教材的最大特点是其系统性。外语教材的内容既涵盖了主题知识,同时还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教材中丰富的主题知识需要依托于多种学科专业,以及各自的学科传统和知识体系。同时教材应该充分地体现语言知识和技能的结构体系。例如 Richards (2001) 等讨论了语法分级的原则: (1)简单性和重要性 (simplicity and centrality); (2)频率 (frequency); (3)可学性 (learnability); (4)语言距离 (linguistic distance); (5)交际需求 (communicative needs)。到目前为止,语法项目的分级主要依据还是经验,缺乏实证的检验。Nation (2016: 6) 则提出词汇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频率”“范围” (range, 即在不同类型的语篇中出现的次数) 和“发散度” (dispersion, 即在不同语篇中均匀出现的情况)。

在外语教学传统中,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编写内容的选择和处理方式也有所不同。教材编写需要根据教学目标和要求,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选择。在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包括主题范围,语言知识,活动类型等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教材编写要充分研究课程标准,同时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广泛征求专家和一线教师,甚至学生的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编写方案和样课。编写方案和样课经过充分论证和检验后再启动正式

的编写。

3) 教师和学生实际情况

教材编写还需要考虑教师和学生因素。就教师而言,教师的文化背景、教师的语言水平、教学理念、教学经验、需要什么样的支持等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就学生而言,学生的母语和文化背景、学习的目标、学习经历、情感特征等都是教材编写中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会对教材编写中语篇的选择和内容的呈现产生影响。外语教材的最终目的之一是帮助学生掌握外语。外语教材必须提供规范、优质的语言输入。因此,外语教材的语篇选择极为重要。选择的标准一般包括:符合学习者内在兴趣(与学习者经历、年龄和成熟度相关)、长度适中、语言难度和认知难度适中、文化适切、符合学习者语言学习潜力、具有美学价值、容易记忆,等等(Maley 2016)。

此外,一些内容呈现方面也需要充分考虑学生因素,包括学生的文化背景、认知特点、知识结构等,特别是学生未来发展的需求。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1)教材中以什么样的“英语”为主?标准英语、英国英语还是美国英语、世界英语?英语教材编写中需要重新思考标准英语的问题。在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当可能考虑是世界英语还是作为通用语的英语的问题。(2)教材中呈现的目标语文化以什么文化为主?英美文化、英语国家文化、世界文化还是学习者本国文化?如何协调这些内容的比例和呈现方式?(3)选文方面,经典和时文之间的比例如何确定?好的语言素材可以让学生观察语言规则,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对话题展示开放的观点,关注学生的情感,给学生带来享受(Brumfit & Roberts 1983)。(4)如何利用多模态更好地呈现教材内容?词汇、语法如何处理?Harmer & Thornbury(2002)指出,词汇一般在一段有一定间隔的时间内至少重复出现7遍才有可能被记住。Widdowson(2000)指出,这些词汇应该尽量出现在符合学生需求和目标的材料中。同时,学习者应该有机会学习一个词的不同层面的意义。有些词可以直接教,有些可以用间接的方式教。语法教学究竟采用哪种方法更有效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语法教学应该采用折中的方法。折中当然并不意味着是随意的,语法教学需要考虑学生的年龄、水平、认知成熟度、对学生的要求、语法项目本身的特点等等,是个复杂的决策过程(Borg 1999)。

4) 技术支持

在过去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教材的呈现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传统的纸质教材,到配有声音(录音)的有声教材,到配有声音、图像(录像、视频等)的多媒体教材,再到与互联网或各种应用程序连接的立体性教材。近年来,随着虚拟空间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教材的呈现方式更加丰富。例如,有学者(如Hartle 2022)提出了“混合式教材”(blended materials)的概念,包括传统的纸质教材、慕课、其他网络资源等。最近,如何在教材编写和教材使用过程中科学合理地使用ChatGPT也成为研究人员和一线教师关注的话题。

当然,教材的呈现方式无论如何演变,其目的都是为了创造真实的语言交流场景,使教材立体化、生活化,增强其真实性,提高学生外语学习的有效性。

3.2.3 教材编写的具体过程

教材编写过程研究包括教材目标的设定、编写方案的编制、单元设计、内容设计、材料选择(包括改编等)、活动和练习设计、修订过程等等。此类研究不仅可以促进编写者对教材编写理论依据的反思,同时还可以帮助优化教材编写实践,并为教材使用者,特别是教师提供了一个如何看待教材,如何理解教材内容背后的目的与依据。

近年来,相关的研究已开始逐渐增多。但主要还在于某些板块的设计与编写过程的描述与思考,如贾蕃、徐晓燕(2023)对思辨能力融入教材编写的实践的描述和反思性研究。更多由教材编写者自己对教材编写不同阶段、不同板块的内容特点和变化过程的描述和反思将对教材理论建设

和教材编写实践水平的提高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3.3 外语教材的评估和使用

3.3.1 外语教材评估

教材评估一方面是为了了解教材本身的质量,如目标评估、内容评估、呈现方式评估、使用效果评估等,另一方面则是为教材的使用、改编修订或补充等做准备。

Buchanan & Norton(2014)曾进行一项针对一线教师的教材评估研究,调查发现教师认为全球性外语教材有以下缺点:(1)听力文本不真实;(2)对语用意义重视不够;(3)过于求保险;(4)文化上不恰当或无关联;(5)缺乏研究基础;(6)单元结构经常重复;(7)语法太多;(8)不能有效使用技术;(9)不能很好地利用学习者的母语;(10)容易过时;(11)版面设计过于拥挤;(12)方法太相似;(13)练习活动/游戏不够丰富;(14)定价太高;(15)目标读者通常是年轻人;(16)对世界的呈现缺乏准确性等等。

评估教材中的文化内容也逐渐引起了学界的更多关注。Risager(2018)提出了教材文化评估的5种范式:(1)国别研究(national studies),聚焦教材中呈现哪些国家,涵盖范围是否广泛,是否多元;(2)公民教育研究(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ies),培养学生全球公民意识的公民教育;(3)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关注教材中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性别、种族、宗教、社会阶层、职业),培养学生的主体性认识和身份认同建构;(4)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关注历史的呈现,包括殖民地历史等,提升学生关于殖民和后殖民的历史意识;(5)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呈现有关跨国组织、观点、显现的内容,提升学生的跨国意识、全球公民能力和全球责任感。

此外,关于教材使用效果的评估,仍然面临一些重要的瓶颈,即如何判断学生外语能力的提升来自教材,而非教学的质量、师生合作,或者学生在教材之外获得的语言输入(Tomlinson 2016a: 1)等。

3.3.2 外语教材使用

Maley(2016)指出,教材只有在好老师手上才能发挥作用。再好的教材在一个没有想象力、没有激情、缺少训练的老师手上也只是废纸。教材应该给老师留白,给他们发挥的空间。但是,老师如果不想成为教材的奴隶,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已有研究表明教材的使用会受到教师素质、经验、教学理念、教学水平等教师相关因素的影响。例如,McGrath(2002: 8)通过调查教师对教材的隐喻来了解教师的教材观。结果发现教师对教材的态度不尽相同,各类隐喻所占比例分别为:指南(a guidebook)20%;支架(a scaffold)18%;跳板(a springboard)14%;菜谱(a recipe)11%;超市(a supermarket)8%;指南针(a compass)8%;生存盒(a survival kit)6%;其他6%;拐杖(a crutch)4%;紧身衣(a straight jacket)4%;圣书(a holy book)2%。有经验的老师对学生的了解要超过年轻老师,教学活动积累和课堂管理经验更丰富,使用教材的方式肯定也就不同(Ainley & Luntley 2007)。

Bolitho(1990)提出了教师、教材和学习者三者之间关系的四种模型,展示了三者之间互动方式的多样性。



图2 模式一

如图2,该模式中,教师作为教材的阐释者和传达者,为学生准确理解教材和使用教材提供了帮助,但其弊端在于教材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背景、其解读教材的水平,同时过多的教师介入可能会影响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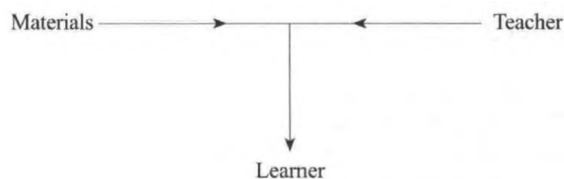


图3 模式二

如图3,该模式中,教材和教师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学生既向教材学习,又向教师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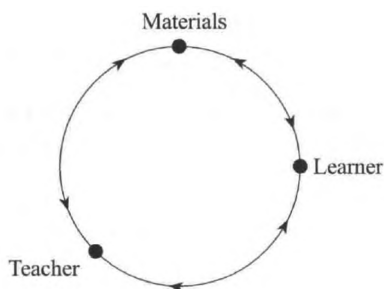


图4 模式三

如图4,该模式强调学生可以直接接触教材,也可以以教师为中介学习教材。三者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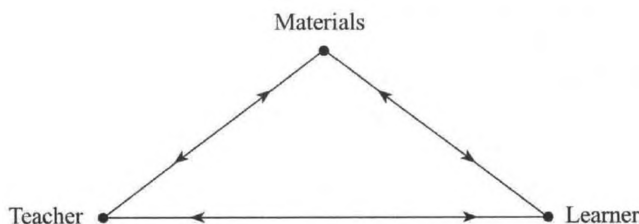


图5 模式四

如图5,该模式与第三种情况相似。但三角的各边并不等同。如果其底线比两边短,则意味着教师和学习者与教材的距离都比较远。可能是因为太难,或者是因为用得少。如果教师和教材之间的距离短,那可能意味着教师对教材认可度高。如果出现问题,教师和学生都可能把责任归咎于教材。

还有一种教材使用情况值得关注和研究。某些学校同时使用两种甚至以上同类教材。教师需要根据教学要求(如地方教育管理部门的统一要求)和学生情况,或者选择不同教材中相关的内容在课堂上开展教学或者交替使用不同教材。这样的做法理论上讲是比较好的。一方面,教师需要研究教材,发现不同教材的特点,针对教学目标、学生实际情况和主题内容选择不同教材中最合适的内容,这不但能提升老师的教学实践能力,也能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另一方面,同样的学习时间,学生接触了更丰富的语言素材,加深了对主题内容和知识的理解,还因为使用不同教材增加了词汇和语法知识的复现频率,其学习效果更好。这样的案例往往发生在学生外语基础比较好,师资水平比较高的学校,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3.4 外语教材与教师发展

教材也是教师培训的重要材料和载体。除了帮助教师落实国家教育政策和应对课堂教学外,

教材开发也是帮助其理解和应用语言学习理论及获得个人和专业发展极为重要的方式(Tomlinson 2003: 67)。

首先,教材是教师发展的资源。教材及配套资源提供的编写说明、活动设计及教学资源是教师落实国家教育政策、理解教材编写理念、提升教学设计能力的主要资源。此外,教育界学者 Ball & Cohen(1999)呼吁开发既能促进学生学习又能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具备教育特征(educative features)的教材。这有待外语学界的进一步关注和研究。其次,教材编写过程可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Shu *et al.* 2023a, 2023b)。教材编写是教师学习的一种特殊形式。教材编写组构成一个特别的命运共同体和学习共同体。由于教材编者往往由熟悉外语教学理论的研究者和熟悉教学实践的一线教师构成,双方在互动和交流过程中可以促进互相的了解和相关背景知识的拓展。另外,由于教材编写的专业要求,教材编写者在编写前和编写过程中需要学习相关教学理论、研究课程标准或大纲要求、研究其他教材、研讨教材编写方案等等,这个过程对提升编写者的教学理念、教学研究能力和专业发展能动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教师培训课程中,甚至在师范大学的课程体系中,也应该考虑纳入有关教材编写的课程。第三,外语教材与教师专业发展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就外语教材对教师发展的贡献而言,体现在教材建设的各个环节:编写、使用、评估等;就教师发展对外语教材开发的作用而言,也体现在教材建设、教材改革、教材理论体系研究等各个方面。

4. 结语

本文从教育生态系统的角度讨论了外语教材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和视角,勾勒了外语教材理论体系的大致轮廓和主要内容。笔者认为,外语教材理论必须研究国家教育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未来国家发展对外语能力的需求;教材研究还要关注相关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如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有关语言习得和语言教育方面的最新成果;教材研究需要研究教材的性质与特点、形态与范围;研究教材的功能和局限;研究教材的内容和呈现方式;教材理论需要研究教材编写的程序和过程、教材编写的步骤、编写的依据和编写的原则;教材的使用研究应该关注教师在教学中对教材的理解和使用情况、关注教材在学生外语学习过程中的实际作用等等。外语教材是外语教育生态系统中各种能量的汇集点,教材研究应该关注各方在系统中所承担的角色,发挥各方的优势,促进教材的最终受益者——外语学习者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Ainley, J. & J. Luntley. The role of attention in expert classroom practice [J]. *Journal of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2007, 10(1): 3 – 22.
- [2] Akbari, R. Postmethod Discourse and Practice [J]. *TESOL Quarterly*, 2008, 42(4): 641 – 652.
- [3] Allwright, R. L. What do we want teaching materials for? [J]. *ELT Journal*, 1981, 36(1): 5 – 18.
- [4] Ball, D. L., & D. K. Cohen. Reform by the book: what is — or might be — the role of curriculum materials in teacher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al reform? [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996, 25(9): 6 – 14.
- [5] Bolitho, R. An eternal Triangle? Roles for teacher, learner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in a communicative approach [C]//Anivan, S.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for the Nineties*. Singapore: SEAMEO Regional Centre, 1990.
- [6] Borg, S. Teachers' theories in grammar teaching [J]. *ELT Journal*, 1999, 53(3): 157 – 167.
- [7] Brumfit, C. J. & J. T. Robert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language teaching. Batsford/David and Charles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83, 6(1): 101 – 102.

- [8] Buchanan, H. & J. Norton. Global coursebooks: Helpful scaffold or debilitating crutch? [R]. Presentation at IATEFL 2014, Harrogate, UK. 2014.
- [9] Carabantes, L. & Amos Paran. “I preferred to take another activity from the textbook”: An activity-theoretical study of learning to des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22, 106(4): 659 – 674.
- [10] Crawford, L. E., Luka, B. & J. T. Cacioppo. Social Behavior [C]// Pashler, H. & S. Yantis. *Stevens'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ondon: Wiley, 2002.
- [11] Dale, L. & R. Tanner. *CLIL Activities. A Resource for Subject and Language Teacher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12] Deller, S. & C. Price. *Teaching Other Subjects Through English (CLIL)*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3] Dubin, F. & E. Olshtain. *Course Design. Developing Programs and Materials for Language Learn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4] Ellis, R. Principles of instructed language learning [J]. *System*, 2005, 33(2): 209 – 224.
- [15] Harmer, J. & S. Thornbury. *How to teach vocabulary* [M]. Essex: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2.
- [16] Hartle, S. Developing blended learning materials [C]// Norton, J. & H. Buchana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aterial Development for Language Teach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 [17] Harwood, 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extbooks: Content, Consumption, Production*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 [18] Hutchinson, T. & E. Torres. The textbook as agent of change [J]. *ELT Journal*, 1994, 48: 315 – 328.
- [19] Maley, A.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 materials development [C]// Soleimani, H. M. M. Esmaili, M. Cacciattolo, T. McKenna, S. Steinberg. & M. Vicars. *Issues in Materials Development*. Rotterdam/Boston/Taipei: Sense Publishers, 2016.
- [20] Masuhara, H. What do teachers really want from coursebooks? [C]// Tomlinson, B. *Materials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1] McGrath, I. *Materials Evaluation and Design for Language Teaching*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2.
- [22] Mehisto, P., Marsh, D. & M. J. Frigols. *Uncovering 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in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M]. Oxford: Macmillan Education, 2008.
- [23] Mishan, F. & I. Timmis. *Materials Development for TESOL*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 [24] Nation, I. S. P. *Making and Using Word Lists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sting*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 [25] Norton, J. & H. Buchana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aterial Development for Language Teaching* [M].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 [26] O'Neill, R. Why use textbooks? [J]. *ELT Journal*, 1982, 36(2): 104 – 111.
- [27] Richards, J.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8] Risager, K. *Representations of the World in Language Textbooks* [M]. Bristol and Blue Ridge Summit, PA: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8.
- [29] Shu, D., Yang, S. & M. Sato. Cultivating a new ecosystem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 focus on researchers in a textbook development project [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23a, 107: 1 – 23.
- [30] Shu, D., Yang, S. & M. Sato. Marrying collective wisdom: Researcher-practitioner collaboration in developing

- ELT textbooks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23b, (1): 1 – 25.
- [31] Tomlinson, B. *Developing Materials for Language Teaching* [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03.
- [32] Tomlinson, B. The Importance of Materials Development for Language Learning [C] // Soleimani, H., Esmaili, M., Cacciattolo, M., McKenna, T., Steinberg, S. & M. Vicars. *Issues in Materials Development*. Rotterdam/Boston/Taipei: Sense Publishers, 2016a.
- [33] Tomlinson, B. & H. Masuhara.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Materials Development* [M]. London: Continuum, 2013.
- [34] Tomlinson, B. *SLA Research and Materials Development for Language Learning*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6b.
- [35] Tomlinson, B. & H. Masuhara. *The Complete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terials Development for Language Teaching* [M]. Hoboken, NJ: Wiley Blackwell, 2018.
- [36] Widdowson, H. G. Critical practices: On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 [C] // Sarangi, S. & M. Coulthard. *Discourse and Social Life*. London: Longman, 2000.
- [37] 贾蕃,徐晓燕. 思辨能力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实践研究[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3, 6(1): 75 – 82 + 95.
-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EB/OL]. (2019 – 12 – 16) [2023 – 3 – 2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 – 01/07/content_5467235.htm
-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EB/OL]. (2019 – 12 – 16) [2023 – 3 – 2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 – 01/07/content_5467235.htm
- [4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EB/OL]. (2020 – 01 – 19) [2023 – 3].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002/t20200210_419656.html
-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EB/OL]. (2019 – 12 – 16) [2023 – 3 – 2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 – 01/07/content_5467235.htm
-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EB/OL]. (2019 – 12 – 16) [2023 – 3 – 2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 – 01/07/content_5467235.htm
- [4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EB/OL]. (2020 – 01 – 19) [2023 – 3].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002/t20200210_419656.html
-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4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46] 束定芳. 构建外语教育教学的新生态[J]. 现代外语, 2021, 44(4): 456 – 461.
- [47] 束定芳. 上海基础外语教育新生态构建: “融合”、“服务”、“引领”——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的实践与创新[J]. 外语界, 2022, 213(6): 34 – 40.

收稿日期: 2023 – 09 – 20

作者简介: 束定芳,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外语教学。

